



总主编·聂石樵 韩兆琦

中国文学经典

杜甫诗选

邓魁英 聂石樵 编注 · 启功题籤

南海出版公司



I222.742/74

邓魁英 聂石樵 编注·启功题籤

杜甫诗选

中国文学经典

总主编·聂石樵 韩兆琦

南海出版公司

200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诗选/邓魁英,聂石樵编注.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7

ISBN 7-5442-2987-4

I. 杜… II. ①邓…②聂… III. 杜诗—选集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900 号

DUFU SHIXUAN

杜甫诗选

编 注 邓魁英 聂石樵
责任编辑 张 桐 张 辉
装帧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987-4
定 价 3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中国文学经典(第一辑)·总序

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漫漫长河中,倘若没有《诗经》、《楚辞》、《史记》……,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没有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我们的世界将会怎么样?

当然,在纷纷攘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知识经济风起云涌的喧嚣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让人觉得迂腐而且好笑!然而,“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如果没有《诗经》的质朴、楚辞的奇丽、唐诗的博大、璀璨、宋词的婉约与豪放、元曲的本色与文采、明清散文和小说的灵动与典雅,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少几分美丽,多几分寂寥;少几许意趣,多几分枯燥!不是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了中国文学的滋润,我们离别的美酒更加香醇,相思的春潮更加澎湃,儿童的心灵更加澄澈,男儿豪情万丈,女儿柔情万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你看,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还有多少男儿具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的肤浅。

有关古诗文的注疏自古汗牛充栋、各领风骚,在出版资源有限的今日中国,大规模组织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新编“中国文学经典”(第一辑以古诗文注疏为主,今后还将陆续出版以古典文学名著评价为主的第二辑,以现当代诗文赏析为主的第三辑,以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为主的第四辑)……,又请来书界泰斗启功先生为丛书题签。那么,我们这套“中国文学经典”丛书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色呢?

其一,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坚持了时间上的大跨越和体裁上的兼收并蓄。“中国文学经典”丛书(第一辑)包括诗经、楚辞、史记、先秦两汉散文、汉魏六朝诗文、唐宋八大家文、李白、杜甫、李商隐、苏轼及历代词赋和元曲、明清诗文小说等经典。其中既有聂石樵、邓魁英、韩兆琦等资深教授诠释经典著作的最新修订本,也有李山、周月亮、鲁宝玉等中青年新锐的呕心沥血之作。所收文学体裁涵盖诗歌、词曲、辞赋、散文、小说、传记,上下五千年,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其二,作者力求使原有诗文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得以尽量客观地再现,在注释与诗文赏析时,力求与原文及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相吻合,而非“望文生义”、“隔靴挠痒”式的诠释。

其三,作者并不满足于泛泛的诗文赏析,也不满足于对诗文思想内容、艺



术特点的简单概括,而是从音韵、修辞、用典、意象、境界等方面对诗文进行具体阐释,以求展现每首(篇)诗文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作者还力求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深入到诗文所描绘的具体环境中去,力求与古人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在心灵交汇中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视界融合”。

其四,加强了诗文所属类别、产生年代、诗人背景资料等方面的知识性。文化现象从属于社会历史现象,研究、了解诗文离不开研究、了解诗人和诗人、诗歌所产生的那个社会年代。将相关资料编入书中,一方面有助于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诗文放在当时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真正读懂、读透。另一方面,读者也可通过诗文阅读,更透彻地了解作品产生年代的文化、民俗、宗教等,有效地补充了历史典籍记载之不足。

其五,丛书力求兼顾作者自身研究的独创性与现有学术成果的继承性、教学研究的实用性和文学欣赏的高雅性。在尊重、继承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力求采用更为合理的观点和说法予以解释和分析,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注释部分力求准确、切要,赏析部分力求篇幅匀称,文笔优美,追求较强的可读性。

其六,诗文入选范围广、跨度大。所选诗文既有历朝历代家传户诵的脍炙人口之作,也有历来公认为佳篇名作而一般选本鲜有选入者,还有少数是作者认为在某些方面独具特色、值得流传后世的。

总之,全套丛书力求兼顾专业性与普及性、高雅性与趣味性,使之既适合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历史系博士、硕士研究生、本、专科学生教材,同时对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文学爱好者和中学师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诗词是心灵的花朵,散文是心田的绿阴。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高校师生和读者能和我们一起去领略美妙的诗情文境。一次阐释就是一次超越古今时空的心灵交汇。但另一方面,一次阐释何尝不是一次险象环生的“导读历险”!更何况学海无涯,历代名家佳作如林,不能尽选;历来评说太多,无法尽收。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故选篇未必精当,难免遗珠之恨;赏析未必完备,难免挂一漏万。疏陋舛讹、偏颇失误之处,祈望读者明鉴、方家斧正、同仁赐教!

“中国文学经典”丛书编委会
甲申年未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自序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很少有诗人可以与之并比的;他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纯熟、精湛程度,也是很少有诗人得以企及的。杜甫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可以说他是把毕生精力、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他的诗歌里去了。这样一位诗人,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诗歌一千二百多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今天,更是拥有广泛的读者。杜诗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及全人类文化中都将永远放射着绚烂的光辉!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死于代宗大历五年(770),共活了五十八岁。这半个多世纪,从将近三百年的唐朝历史看,正属于由盛到衰的转折阶段,而发生在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则是一个转折点。杜甫生逢安史之乱前的全盛时期,即开元盛世,又经历了唐王朝衰落的开端,即安史之乱。杜甫祖上曾从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迁往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后来又迁到了巩县(今河南巩县),他就是在洛阳附近的巩县出生的。他自称家世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时的名将,又是一位历史学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他曾自豪地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闻丘师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的父亲名闲,做过兖州(今山东济宁市、邹县一带)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外祖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清河崔氏。所以,杜甫出身于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

在童年,杜甫就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很发达的文艺,受到许多有益的熏陶。他六岁时在郾城(今河南巩县东南)曾看过著名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他长期居住在文化兴盛的洛阳,受过比较系统的诗歌和书法的训练,“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时,便开始“出游翰墨场”,和当时文坛、官场的人士结交来往。他的诗文曾经受到洛阳名士崔尚、魏启心等人的高度赞扬。

杜甫的青少年时代正逢海内升平、社会富庶、国势强盛的“开元全盛日”,这给予他以很大的激励。他为自己的才能而自负,对于前程充满信心。在后来所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说自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设想通过应进士试显示自己出众的才华,受到皇



帝的重用,以实现那君明臣良、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开元十九年(731),杜甫二十岁时,为了了解社会,增加知识并结识名流以提高声誉,他开始了长期的漫游。他首先南游吴越,去过金陵、姑苏,又到会稽、剡溪。开元二十三年(735),他曾一度回到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接着又北游齐赵,到过赵王丛台(今河北邯郸市东北),登过泰山。按他的说法,这一段生活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才回洛阳。天宝三载(744),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同游梁宋,登单父(今山东单县南)琴台,到过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吹台,并再同游齐鲁。他和李白、高适一起痛饮高歌、论文赋诗、求仙访道、走马射猎,生活得非常快意。到天宝五载(746)他们才分手,李白去江东,高适回梁宋,杜甫也就“西归到咸阳”了。

这是杜甫生活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他已开始了文学创作,可是保存下来的作品却极少,只有二十几首;而且题材范围不够宽广,思想意义不够深刻,那独特的“老杜风格”也还没有形成。但从《房兵曹胡马》《画鹰》《望岳》《赠李白》等诗中,已不难看出他的卓越才能。像他写那“万里可横行”的骏马,写“拭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的雄鹰,表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愿望,抒发“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的感受,都已预示出他未来的发展。

杜甫三十五岁来到长安,目的是要谋求一个官职,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这时的朝政已变得很腐败、黑暗。玄宗于天宝四载(745)册立了杨贵妃后,便深居后官,不理朝政,每日里征歌选舞、走马斗鸡,求神仙、信符瑞。宰相李林甫独揽权柄,上以谄谀、蒙蔽皇帝,下以遏制贤才,排斥正人。天宝十一载(752),阴险狡诈的杨国忠继李林甫为右相,种种劣政,有增无减。这些人怎么会召贤进能呢?天宝六载(747)时,玄宗曾诏令天下有一艺之长的人都到京城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这次考试。结果是李林甫把所有的人都斥退了,自己却上表称贺说“野无遗贤”。这个政治骗局使杜甫非常失望。他只得投诗求韦济、张垞等达官贵人汲引,但也没能收到预期的结果。他又直接向皇帝上表献赋自荐,天宝九载(750)后,先后献了《雕赋》《三大礼赋》和《封西岳赋》。文章虽然被玄宗赏识,但却没有得到什么官职。

杜甫怀着出仕从政的迫切愿望,在长安一共等待了十年。这十年里,他对唐王朝的政治局势、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目睹了贵族官僚们的专横贪婪和那种荒淫奢侈的生活,目睹了在最高统治者的扩边政策下,农业经济、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严重破坏。这期间杜甫个人的生活很贫苦,为了求取官职,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日食太仓五斗米”(《醉时歌》),来勉强维持生活,甚至“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纵然贫困,他也不愿离去,因为他越是见到政治腐败、边疆失利、社会凋敝人民困苦,就越希望有机会为

改变这种状况出一把力气。直到天宝十四载(755),朝廷才任命他为河西(今云南祥云县附近)县尉。但他因不愿当这种直接鞭挞百姓的官,所以辞却了。又让他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个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的从八品下的小官,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接受了。这对于“窃比稷與契”的杜甫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因而他写了一首《官定后戏赠》,幽默地表达了自己伤心而又愤懑的感情。官定后,杜甫曾经一度去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看望寄住在那里的妻儿。到家后才知道他的小儿子竟已饿死了。这时杜甫的生活处境已经和广大人民越来越接近了。

这长安十年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阶段。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保存下来的诗歌不但在数量上已达到了一百一十首左右,而且内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像《兵车行》《丽人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前出塞》《后出塞》等,或谴责皇帝、宰相、贵戚们的骄奢淫逸,揭露统治集团的穷兵黩武,指斥武将的位崇气骄;或反映人民在租赋压迫下的饥寒困苦,远戍士兵的不幸遭遇;或表达对于国势衰微的忧虑,对于人民的深切同情,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是杜甫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它抒发了作者内心的矛盾与苦闷,揭示了安史之乱行将爆发时的种种社会危机。它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已跨入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正当杜甫去奉先探家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边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他们利用了唐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昏聩腐败,挑动民族矛盾,企图夺取政权。但他们的身份是唐王朝的节度使,所以安史之乱主要是一场地方军阀反对中央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次年初,杜甫回到长安在率府供职。很快,安禄山叛军就攻破了洛阳。六月,潼关失守,长安危急,皇帝、贵族和百官纷纷逃散。杜甫先在五月里回到奉先,携带着妻子儿女到白水县避难。潼关失守后,白水一带也陷入战乱之中,他们一家人便又和百姓一起忍受着饥饿、劳累,仓皇逃亡。最后,他才把家眷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暂住下来。八月,杜甫只身北上,准备去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北)投奔新即位的肃宗,以期报效朝廷。但刚启程就被安史叛军俘虏了,并被押送到长安,一直困了八个多月。这期间,他亲眼看到了都城沦陷的惨状、叛军烧杀掳掠的暴行,实地体验了国破家亡的哀痛。

至德二载(757),肃宗又迁驻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五月,杜甫乘机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历尽千难万苦奔赴行在。到达后,肃宗任他为左拾遗。在《述怀》诗中他记载当时的情况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他决心忠于职守,以匡扶君主,完成中兴大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房琯罢相的事。杜甫“见时危急”,认为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不宜轻易地废黜大臣,所以以谏官身份疏救房琯。他的直言谏诤竟触怒了肃宗,被拘送御史



台推问。幸亏有张镐等人出面营救,才免受刑戮,从此以后肃宗对他便“不甚录用”了。到闰八月,肃宗特准他回鄜州去探望家室,于是,杜甫心情沉重地回到羌村。他把自己这时的心境、一路上的见闻和对时事的看法,都写在长诗《北征》中。不久,长安、洛阳相继收复,十月里肃宗还京,杜甫也携带家眷回到了长安,继续当他的左拾遗。他是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房琯事件竟使他失去了这种条件。所以这时杜甫生活尽管比较安定,但精神却是非常矛盾、痛苦的。他一面“避人焚谏草”(《晚出左掖》),小心谨慎地供职;一面“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因而“每向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以排遣自己的苦闷。这样的仕宦生活只持续了半年多,到乾元元年(758)六月就又发生了意外的变化。肃宗把房琯、严武等人贬往外地,杜甫也被看做是他们的“同党”而出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一打击又把他的生活和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杜甫在华州任上,更有机会实地接触社会。他看到了那“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无家别》)、“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凄惨景象;看到了人民在不合理的赋税和兵役制度压迫下所蒙受的深重灾难。他更了解到朝政的乖张、腐朽。面对这种情况,杜甫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绝望了,再加上关中饥谨,因之,在乾元二年(759)的秋天,他便以生活穷困为理由而弃官了。而这时,老家洛阳正在骚乱,不能回去,于是,他就携带全家人从华州出发到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由于饥寒交迫,只得靠采药、卖药维持生活。“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他听说同谷地方很好,所以住到九月又离开秦州南行到达同谷(今甘肃成县)。但在同谷,生活并不如想像的那样容易维持,他们甚至拾橡栗和到深山里去挖山芋充饥。这样过了约一个月,于十二月一日又出发前往成都。这一年之内,杜甫从洛阳到华州,到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又到成都,正像他在《发同谷县》中所说,是“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直到岁末才到达成都。

从天宝十五载(756)春到这时,是杜甫生活的第三个阶段。这前后四年的时间里,他逃难、陷贼,辗转迁徙,饱经忧患;在政治上受冷遇、被贬谪,遭到了不少打击,但是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却是空前高涨的。杜甫在这个时期共流传下来近二百五十首诗,像在沦陷的长安写的《春望》《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到鄜州探家时写的长诗《北征》,在华州任上写的“三吏”、“三别”等,都是很优秀的诗篇。它们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高度的爱国精神。杜甫常常是直接写时事,真实地反映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灾难,叛兵对于长安、洛阳一带的严重破坏,并揭露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黑暗。如关于陈陶、相州的大败,肃宗借兵回纥的决策,李辅国、王玙一流的得势等等,都有所反映。在从秦州到成都的途中,他也写了很多诗。如《秦州杂诗二十首》记叙

在秦州的游览和感怀;《同谷七歌》记录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又写了很多纪行诗,记载沿途所见的各地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这些诗中都充满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感情。杜甫这个时期的诗歌构成了他个人和整个唐诗的现实主义的高峰。

上元元年(760)春季,杜甫依靠亲友的资助,在成都浣花溪畔建成了一所草堂,开始定居下来。这时他已经四十八岁了,经过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总算得到了一个安身之所。草堂背向成都城郭,临近百花潭,是一个极幽雅的江村。那里的翠篠、红蕖、杨柳、梅花、水鸥、黄鹂都吸引着他。他或流连山水,游览名胜古迹,或经营药圃,和邻居农民往来。这时故人裴迪、高适、严武等都先后来到了西蜀,他们经常互相寻访,饮酒唱和。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诗兴倍增,用诗歌描绘草堂周围的风光,记叙自己的生活。可是,他这时内心却不是安适平静的。他念念不忘“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建都十二韵》),时刻关怀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像对于李辅国之流的“媚至尊”,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吐蕃的侵扰,他都感到很忧虑。他十分同情在“一物官尽取”的情况下人民受压榨的处境,并常常因想到自己的政治遭遇而悒郁不平。所以他这时写的诗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和肃宗相继死去,代宗即位。七月,成都尹严武被召入朝。杜甫送严武直到绵州(今四川绵阳)才分手。正在这期间,成都少尹徐知道叛变了,他不能回去,只得转投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去避乱。这样,杜甫就又从安静的草堂中走出,重新开始了那种忧患的生活。深秋,他把妻子接到梓州来寄住,自己奔走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绵州和汉州(今四川广汉县)之间,靠着应付那些地方官而得到些生活之资。到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战败并自缢死,其旧部纷纷投降,持续了七年多的安史之乱才算结束了!杜甫远处梓州,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喜若狂,写下了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但他这种欢乐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又陷入愁苦之中。唐王朝经过多年的战乱,再加以天灾不断,“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其经济和政治实力已很难恢复。可是统治集团并不去改革积弊,反而更加腐败奢侈,穷事搜刮。诸镇也多跋扈不臣,据地自雄。又有吐蕃等乘机侵扰,占据长安,掠府库、焚官室。西川的松、维、保(今四川理番县一带)等州也都失陷了。各地人民负担军需、充备百役已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这种种情况杜甫都根据自己的见闻用诗歌作了真实的记录。

这时候的杜甫已是贫病交加,为了避乱和寻求生路,在广德二年(764)初春,他携带妻子到达阆州,准备从水路去渝州(今四川重庆市),转道东下出峡。在即将成行时,又得到了严武重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消息,他感到“殊方又喜故人来”,于是决定再回成都草堂去。

回成都后,由于严武的推荐,杜甫当上了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并赐绯鱼袋。这时他已五十二岁了,因为年老多病,又厌恶官场生活,只勉强地干了半年,在永泰元年(765)正月就去职了。不久,严武忽然病死,他在成都失掉了凭依。所以,到五月里便带领全家人离开草堂,开始了他最后漂泊荆楚的生活。

杜甫自从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入蜀,到这时差不多已有五年半的时间,这是他生活的第四个阶段。这中间他虽然曾有一年多到外地避乱,但主要的生活都是在成都度过的。这里号称“天府之国”,自然环境、经济条件都比较好,他在这里的生活相对来说比前一阶段要好得多。他用诗歌尽情地歌咏自然景物、记述自己在那佳山秀水之间的活动,可是,他却始终和那个时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非常焦急地关注着政局的变化,时时不忘“兵革未息人未苏”的现实。安史之乱中,他盼望早日平息战乱;安史之乱平息后,他殷切地希望统治集团改弦更张,复兴国家。他这时写了四百四十首左右的诗歌,总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质,有很多是抒发伤时念乱、忧国忧民感情的律诗。这些抒情诗中反映出了当时的政治事件、战争消息和社会状况,如《蜀相》《枯棕》《花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征夫》《遣忧》《有感五首》《释闷》等许多优秀的篇章,都是千古绝唱。

杜甫离开成都后,乘船南下行经嘉州(今四川乐山县)、戎州(今四川宜宾县),又过渝州(今四川重庆市)和忠州(今四川忠县),直到九月抵达夔州的云安(今四川云阳县),才因为肺病和风痹发作而不得不停留下来养病。半年后又迁往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居住了近两年之久。他仰仗别人的资助,租借了房屋、田地,并得到了一片柑林,他在那里养鸡、种菜、经营果木,生活还比较稳定。直到大历三年(768)早春,才放船出瞿塘峡。这期间,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义骄奢暴戾,下属和士兵都极怨恨。汉州刺史崔旰率兵攻打郭英义,邛州(今四川邛崃县)等地牙将们又联合起来讨伐崔旰,于是蜀中大乱。同时,其他地方又有吐蕃、回纥进扰、各镇拥兵作乱的消息频传。杜甫所到之处,总要遇到避乱逃亡、饥寒困苦的人民。尤其是夔州地方,物产不如成都富饶,人民赋税负担奇重,生活处境极其悲惨。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人民生活 and 思想感情的了解更加充分了,他“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常常发出“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窄”(《驱竖子摘苍耳》)的感叹。他常用诗歌反映当地人民的风俗和生活处境,在夔州那雄壮奇险的山川之间,他也写过不少歌咏自然风光景物的诗。但总的来说,这时杜甫虽然身处偏僻的山城,而他的诗歌却没有远离那战乱的时代和苦难的人民。

杜甫离开夔州后,在二月到达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因为生活没有着落,到秋天迁往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东北),岁末又从公安出发南行到岳州(今湖南

岳阳县)。大历四年(769)春,继续南行入洞庭湖,抵达衡州(今湖南衡阳市)。从此,杜甫又“南北逃世难”,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和衡州之间往返漂泊了一年多。他这时已耳聋失听,右臂因风痹而不能动转。全家人长年居住在船上,为了维持生活,他还得去渔市摆摊卖药。他感到“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自己已经“处处是穷途”了!大历五年(770)秋天,他想南下郴州(今湖南郴县)投奔他的舅父,但为洪水所阻,不能成行。于是又计划北上汉阳,沿水路回北方去。船经洞庭湖时,他带病伏枕写成《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抒发了对于“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世事的感慨,叙述了自己贫病交加的悲惨处境。过不久,杜甫就死在湘江上游他那条破船上了。

以上这五年多时间是杜甫生活的第五个阶段。这是他伤时念乱、忧国忧民,内心最痛苦的时期;是他年老多病、南北流浪,生活最凄惨的时期;也是他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这五年多他写的诗共有六百三十余首,比以前任何阶段都多。杜甫这时在生活上、感情上和人民越来越接近了,所以他写了很多直接反映人民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诗歌,这些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刻性上更超越了过去。像《驱竖子摘苍耳》《遣遇》《岁晏行》《写怀》《昼梦》《蚕谷行》等,集中笔力揭露了封建剥削的罪恶,并提出了进步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另外,面对战乱不息、忧患重重的社会,和个人贫病交加的处境,他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穷途末路的悲伤。这时的诗往往带有总结的性质,像《夔府书怀四十韵》《遣怀》《昔游》《壮游》《历历》《诸将五首》等,或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或回顾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化过程,反映时代面貌,总结历史教训,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杜甫的一生是用诗歌谱写的一个悲剧,它的意义在于揭露了唐王朝盛极而衰这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矛盾、动乱、黑暗和腐朽,揭露了形成他的悲剧的那个恶劣的社会环境,从而展示了他那种坚韧、不屈、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精神。

杜甫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一千四百五十多首,实际上他一生所作的并不止这些。在天宝九载(750)的《进雕赋表》中,他说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天保存的天宝九载以前的作品不过四五十篇,这以后的作品可能也有很多遗失,可以想见他的创作量该是多么大了!

杜甫的诗歌广泛地、深刻地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即反映了自唐建国以来所推行的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均田制的破坏,在均田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租庸调法和府兵制的废弛;反映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对内横征暴敛,对外连年用兵,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反映了唐王朝与当时邻近民族和部族政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地军阀的长期混战;反映了广大人民在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受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处境。总之,它反映了唐王朝在那三四十年间由盛到衰的历



史转变。所以,杜甫的诗歌一向享有“诗史”的称誉。如宋朝胡宗愈所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可以说,杜甫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实际的感受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他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不仅应该看做是他个人一生的传记,而且也是八世纪中叶唐代社会的可靠历史。

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最辉煌的成就,主要在于它忠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前后不只一次地把地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农民的饥寒困苦做了对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驱竖子摘苍耳》中的“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岁晏行》中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这些诗句都典型地概括了贫富悬殊的两种阶级生活。更可贵的是他还不自觉地接触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问题。他揭露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子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甘林》)。官府运用杀戮、纠责的手段向人民索取繁重的赋税,掠夺走他们生产的布帛和粮食。这种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杜甫的笔下反映得多么明确!经过长期的观察、分析,到晚年他对于封建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写怀》),指出贫贱者所以悲哀、困苦,正是由于有贵者、富者的存在。这些应当说是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的精髓。

杜甫在他的诗歌里忠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被残酷压榨、暴虐奴役的痛苦,和他们对这种处境的不满。他总是把人民的遭遇和心理活动放在那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写,而且用艺术形象和诗的语言描写,所以能够充分地显现出当时黑暗、战乱的时代特点。这些有的是正史所不载的,因而可以补史书之不足。

天宝年间,由于贵族官僚、地主富商以及寺院僧侣的兼并土地、广置庄园,致使唐初推行的均田制遭到了破坏,许多农民失掉了赖以活命的土地。统治集团又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扩边战争,为取得军事经费和满足其奢侈享乐生活的需要,他们大量征兵,并利用名目繁多的赋税加强对人民的搜刮。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的生活处境非常悲惨。作于天宝十一载(752)的《兵车行》,就描写了在连年的对外战争中,劳动人民被迫离乡背井,从军服役。他们“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或长期守边,或战死沙场,以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垅亩无东西”,“千村万落生荆杞”的现象。本来按唐旧制:“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新唐书·杨炎传》),可是实际上却是戍边兵士长期不返,家中的租税也并不蠲免,甚至士兵已经战死在外,官府还照例向他家索

取租税。这里反映了在当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已经败坏的情况下,戍边士兵及其家庭的悲惨遭遇。“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这正喊出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的结尾写道:“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涕泪不可掇!”“远戍卒”,就是家中田地荒芜,仍旧负担着沉重租税的士兵;“失业徒”,就是在土地兼并和赋税的压榨下失掉了原有田地的农民。杜甫目睹了统治阶级的奢侈挥霍,身经了幼子“无食致夭折”的悲痛,因而他很理解人民的困苦,对他们产生了真诚的同情。这种生活和感情正是他后来不断用他那现实主义的诗歌反映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苦难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杜甫的一组杰作“三吏”、“三别”,不仅反映了安史之乱给唐朝社会及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反映了唐王朝官吏的残暴和人民在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下的痛苦遭遇。如《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按唐律:“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又据唐朝的“丁中制”规定,人有黄、小、中、丁之分。天宝二年(743)令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成丁。而这时体弱的瘦男和身量短小、未成丁的中男也都在点选之例。《石壕吏》中所写的一家,三个儿子全被征去当兵,老妇也被带去服役。这些现象正反映了这个时期府兵制已几乎荡然无存了。安禄山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造成了“园庐但蒿藜”,“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惨象。在朝廷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下,那些扶杖的老翁、不成丁的中男、新婚的青年、刚从沙场回来的军人,都得去从军服役。这时,饥饿与死亡严重地威胁着广大人民,杜甫和他们一同发出了“何以为蒸黎”的愤怒呼喊!

杜甫在西蜀和荆楚的长期忧患岁月中,更直接地接触到苦难的人民,他念念不忘“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建都十二韵》),时时忧虑“人今罢病虎纵横”(《愁》)。他这时反映人民受赋役压迫的诗歌的思想深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他忠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在地方军阀势力互相残杀,和吐蕃、回纥不断进扰的情况下,朝廷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勒索、搜刮。广大人民在战乱中生命没有保障,还得把财物输往京城。如“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喜雨》),“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又上后园山脚》),“分军应供给,百姓日支离”(《赠崔十三评事公辅》),“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窄”(《驱竖子摘苍耳》)。还有《遣遇》《东屯北崦》《甘林》等,也都有力地谴责了统治阶级的“割剥及锥刀”、“索钱多门户”、“一物官尽取”。这时,人民被抢夺一空,已经是“欲须供给家无粟”了,甚至出现了“空村唯见鸟,落日未逢人”的凄惨景象。《岁晏行》更具体地描绘了在官府盘剥下人民的苦难生活,渔夫因天寒网冻而打不

上鱼来；猎人射得的鸟也卖不出去。“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他们只得卖儿鬻女去缴纳赋税。《客从》则以寓言的方式控诉了统治阶级吸髓吮血的残酷剥削。

当时妇女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也是杜甫诗歌中着重写到的一个问题。依唐律：“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新唐书·食货志》）但这时原来的法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妇女的遭遇是：“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虎牙行》），“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遣遇》）。她们的丈夫都是在征戍中死去的，而她们都仍在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又呈吴郎》中无食无儿的老妇人，也是因为“征求贫到骨”，只好打些别人家的枣子充饥。《兵车行》中的征人妇还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把锄扶犁，而这时的寡妇则已失掉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有在哭泣中表达她们的悲愤了！杜甫的诗歌中还常常写到：“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新安吏》），“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阁夜》）。这白水青山、城市路衢之间的哭声，千家万户的哭声，正是那个悲剧时代的真切反映。杜甫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高度艺术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总面貌。

杜甫的诗歌还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朽、生活上的奢侈和道德上的败坏，谴责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在杜甫的笔下，那由王侯将相组成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极其丑恶龌龊的集团。他们都是些残暴的“奸雄恶少”、无知的“乡里小儿”。这些人“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贫交行》），“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洗兵行》）。一个个穷奢极欲、专横跋扈、趋炎附势。杜甫对统治阶级揭露和谴责的面是比较广的，上自皇帝，下而后妃、贵戚、宰相、将帅，以至贪官、暴吏，他都触及了。像玄宗信任的李林甫是“阴谋独秉钧”的奸相，杨国忠是“炙手可热”的权豪势要，安禄山是“气骄凌上都”的野心家。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等的弄权乱政，是“关中小儿坏纪纲”（《忆昔》），“政化错迕失大体”（《石笋行》）。这些人执政掌权的结果，必然是“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建都十二韵》），把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不可收拾。他们平时陪着皇帝歌舞宴饮，接受俸禄、赏赐，当国家危难时，竟没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作者指责说：“狼狽风尘里，群臣安在哉”（《巴山》），“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表达了对这群人的鄙视与愤慨。如《诸将五首》《草堂》《绝句三首》等则揭露了将帅的无能、地方军阀的拥兵作乱和官军的扰害百姓。那些“边头公卿”是“唱和作威福”，“谈笑行杀戮”。又“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官军竟是“纵暴略与羌浑同”。作者通过他对统治阶级的揭露，说明了这些人的昏庸、骄奢、暴虐，正是国家动乱、衰败的根源。

杜甫在诗歌中还比较侧重于揭露、谴责上层统治集团的奢侈荒淫。如《乐游园歌》的“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诩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写玄宗通过夹城从大明宫往芙蓉园和曲江去游玩，在那里观舞听歌纵情享乐。《壮游》的“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斗鸡》的“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官人出，楼前御柳长”，写玄宗用人民缴来的粮食养鸡饲马，以斗鸡走马，寻欢取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在骊山上“君臣留欢娱”的情况，他们不顾国家兴亡、人民死活，只管浪费从劳动人民那里掠夺来的金银、绢帛。“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揭露了昏庸的玄宗宠幸杨贵妃，对杨国忠兄妹赏赐无度。《丽人行》则集中揭露了那些贵戚们的挥霍享乐、蛮横骄纵、荒淫糜烂的生活。作者写到“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她们是皇帝亲封的国夫人，宴饮时有宦官特地送来御厨珍肴以助兴佐乐。“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他们蛮横骄纵，气势凌人。这就揭示出这些贵戚们的行为是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支持与庇护的。

《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等通过具体的事实揭露了天宝年间统治集团不断发动扩边战争，致使士兵长期远征并大量死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不只指斥了将帅们以杀人略地去邀功请赏：“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后出塞》），还直接地批评了玄宗的穷兵黩武：“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他显然是把扩边战争的罪恶根源追到最高统治者的头上了。又如《洗兵行》中的“奇祥异瑞争来送”是讽刺肃宗的迷信鬼神；“鸡鸣问寝龙楼晓”是讽刺肃宗及玄宗父子之间的矛盾。《忆昔》中的“张后不乐上为忙”，“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显然是讽刺肃宗的畏惧张后和在平息战乱上的昏庸懦弱。《有感五首》的“愿闻哀痛诏，端拱间疮痍”，《释闷》的“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则是讽刺代宗不能吸取前朝教训，改弦更张，而是依然穷事搜刮、姑息养奸。总之，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一些弊端败政，杜甫都触及了，我们实在不能不钦佩他有胆有识的史笔！

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不只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与同情，并愤怒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用这种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批判统治集团，并传达出广大人民的愿望。杜甫一生始终痛苦地思索着国家衰败的症结所在，探求着摆脱内外交困局势的途径。他很向往太宗朝那种“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行次昭陵》）的政治局面。他希望重见“开元全盛日”那种“叔孙礼乐萧何律”、“公私仓廩俱丰实”、“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的政治休明、

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世道。他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伤春五首》），“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他反对侵略战争，主张统治集团提高道德修养，做到上下节俭，百官廉洁，减轻赋税和劳役。在《往在》一诗中更具体地写道：“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这当然不是代宗朝已经做到了的，而实际上是杜甫在全面地勾勒自己政治理想的蓝图。他设想割据的藩镇都归顺朝廷，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战争永远停息，征人和流亡者都能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君臣节俭，上下同德；皇帝能够励精图治，从谏如流。总之，他殷切地希望恢复唐王朝建国之初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理想和那个现实恰成鲜明的对比，因而作者热情描绘自己的理想，就具有揭露和批判那个现实的积极意义。再如在《昼梦》中，杜甫更提出了“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的梦想，在《蚕谷行》中提出了“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的愿望。这样的理想虽不能指导人们去变革那黑暗、动乱的社会，但它却揭露和批判了现实，并且传达出了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和他们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愿望。杜甫的很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就正是在这种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引导下创作出来的。因而，我们读杜甫的诗常会感到在他批判统治阶级、反映人民疾苦时，总有一个思想贯穿于其中。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具有理想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杜甫不但在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再现生活方面耗尽了毕生的精力，而且在探讨诗歌的艺术手法上也呕尽了心血，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就说明他为了出语惊人而字斟句酌，为了音律完美而反复吟咏的艰苦的创作实践。他曾多次谈到作诗的“苦用心”。在一些题画诗里也常说：“更觉良工心独苦”（《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其中也概括有他诗歌创作的深刻体会。杜甫就是在刻苦钻研、琢磨并继承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

杜甫吸取了乐府歌辞的表现手法，但不沿用古题，不拘泥于古调，而是根据现实题材，另立新题，自由抒写，创作了许多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诗篇。元稹所谓“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乐府古题序》），即道出了杜甫诗歌这方面的开创意义。像《兵车行》《丽人行》《佳人》《前出塞》《后出塞》《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留花门》及“三吏”、“三别”等等，都是这类名篇。在描写方法上，他采取了乐府歌辞朴实的叙述、精细雕琢的手法，但又有所创